

劉江華「入閣」「旋轉門」待建

□南 禮



劉江華獲委任為副局長，本是一件十分正常的事件，卻惹來反對派的批評。有的指責他「落選」又能「升官」，不合民意；有的甚至動用政治道德，以曾經「叛黨」為由，攻擊他誠信有問題。冷嘲熱諷的評論更不在少數。

如果那些批評者仍然認為，政府應當用人唯才，而不是「唯立場」，那麼劉江華為何不能「入閣」？那些極力反對劉江華的人，實際上是在以一種極端的排它心態，去否定一個健康的「旋轉門」機制。假設反對派有朝一日「執政」（並非沒有可能），他們如果堅持這種心態，將遇到無人可用的狀況。

選舉落敗 = 不准入閣？

回答劉江華是否「適合」做副局長，其實是一個「偽命題」。原因在於，劉江華個人能力有目共睹，其「入閣」與否，非由議會決定；而他要負責的對象是行政長官與香港市民，與反對派沒有直接關係。因此，反對派及其支持者所作出的所有批評，更多的是從政治立場出發的妒嫉。而這種心態，實際上是與所奉為主臬的西方民主制度相去甚遠。

反對劉江華的理由，說來說去無非只有兩個。一是他在選舉中落敗，二是他曾經「叛黨」。這些理由似是而非，毫無民主氣度與理論素養。在香港市民所熟悉的西方民主制度國家，除非是行議會制度（只有議員才能擔任政府主要閣員），否則，在選舉中落敗的人士加入政府任職，是再正常不過的現象。

一如見諸於專欄中的例子，一九九零年彭定康失去巴里斯選區的下選院席位，無法在政府中擔任要職，於是晉身為殖民地港督。兩年前，加拿大聯邦保守黨哈珀，任命在大選中落敗的巴雷實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大使；與此同時，他還委任了三人在大選中落敗的眾議院議員：史密斯（Larry Smith）、曼寧（Fabian Manning）、文娜（Josee Verner）為參議院成員。這種例子見怪不怪，早成西方慣例，說它是「籌庸」也好，「任命」也好，總之，在所謂的民主制度國家，這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若要數香港市民熟悉的例子，可算是四年前在美國總統選舉民主黨初選中落敗的希拉里克林頓，她最後被委任為美國務卿，並獲參眾兩院通過。

以上例子說明什麼？至少說明一點，在選舉中落敗，不能等同不能「入閣」。當然，反對派總會說，特區政府是「不民主」產生的，一切決定都缺乏民意基礎。但劉江華雖然落敗，卻擁有近二十萬

人支持，人數是大部分反對派議員的數倍，這還能說是「沒有民意基礎」？在整個特區政府官員中，還有誰比他更有民意基礎？反對派不是常堅持要有政黨制度，以前議員的身份加入政府，又有何不妥？

曾經退黨 = 道德問題？

攻擊劉江華的人，總會拿他二十年前退出「港同盟」的例子來說事，有的甚至用上「三姓家奴」這類具有侮辱性的字眼。但如果熟悉情況就能看到，所謂的「叛黨」，根本是攻擊用語。劉江華於一九九一年退黨，其後成立「公民力量」，到一九九八年加入民建聯。一個相隔七年的政黨身份轉變，又怎能稱得上「叛變」？而這種轉換「黨籍」的做法，西方議會更是屢見不鮮，卻難見有香港反對派之類的極端批評。

例如，二零零七年六月，英國工黨首相白高敦就任首相前一日，最大在野黨保守黨前影子內閣成員昆廷，戴維斯宣布轉投工黨陣營；零九年四月，共和黨資深參議員斯佩克特（Arlen Specter）宣布退黨加入民主黨陣營。同年十二月眾議院民主黨議員格里費茲（Parker Griffith）以不贊成民主黨的醫療改革方案為由，宣布轉投共和黨陣營。

這種退黨、入黨的做法，在西方議會並非少見

，而公眾對此也早習以為常。劉江華早年因政見不合，退出當時的「民主派」，自立門戶，其後才加入民建聯。說到根本，這是對香港前途、政治議題的看法的不同，而不應成為所謂的「叛黨」式的「道德問題」。

呼唤健康「旋轉門」制度

劉江華「入閣」遭遇反對，事件本身說明，香港的反對派政黨仍然缺乏一個成熟的民主制度思維，仍然停留在「唯立場論」的低水平。實際上，在當前的兩派惡鬥政治生態下，香港不僅需要像劉江華這樣的人才加入政府，更需要建立一個健康的「旋轉門」制度，以讓更多有才、有民意基礎之士加入執政團隊，消除不必要的心態對政治偏見，注入更多基層民意，為政府增添更務實聲音。

自零五年設立問責制以來，「旋轉門」概念漸為公眾熟悉，三屆政府的「組閣」也在某種程度上推動了這種制度的形成。然而，公務員成為問責官員後，無法回到公務員隊伍；智庫成員加入政府後，又無法回到智庫，或者說無法像往常一樣工作；而前議員加入政府，又遇到種種攻擊，身負落選的「原罪」。這些問題顯然滯礙了人才加入政府、服務社會的良性循環。

美國是旋轉門運作最佳的國家，他之所以成功，原因有多種。但它容忍「叛黨投敵」者的存在，兩黨之間才會做到雖然分庭抗禮，卻不誓不兩立；而公民社會會以包容的心態對待加入政府的人士，營造了「唯才是用」的氛圍。這些成功的例子，完全可供香港借鑒。

作者為資深評論員

解決六大民生任務艱鉅

□曾淵淦

總理溫家寶要求特首梁振英好好處理的就業、物價、住房、貧困、環境、老齡化等六項民生問題，的確是今日香港所面對的嚴重問題，如同向上任仍不足半年的梁振英面授機宜，如何提高民望、支持度。



特首梁振英上京述職，總理溫家寶要求他好好地處理六項民生問題，這包括就業、物價、住房、貧困、環境、老齡化。

溫總理的任期將屆滿，但他依然很關心香港，也很了解香港。他所提出的六項民生問題的確是今日香港所面對的嚴重問題。他向上任仍不足半年的梁振英提出這六項民生問題就好像是在面授機宜，在教導梁振英如何提高民望、支持度。

不過，這六項民生問題的確很棘手，而且有相互關係，並且與經濟發展脫不了關係。西方國家以舉債、印鈔票來解決民生問題，提供大量福利，結果債台高築，競爭力日降，這是香港永遠不該學習的。

西方福利主義不可取

過去十年，我們見證了中國經濟發展一日千里，成了世界工廠，成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也見證了香港經濟增長放緩，生產總值竟然被新加坡超越。不但如此，新加坡在民生問題上也比香港好，以上述六項民生問題來看，新加坡的就業問題幾乎完全不存在，失業率超低，更要輸入數量龐大的外勞。新加坡幾乎每個家庭都是房屋的業主，平均居住面積比香港人大許多，政府興建的公共房屋最小也有1000平方呎。全國85%的人口就居住在這類房屋裡，基層與中層同住一層樓，拉近社會差距，經濟好，人人有自己的房屋。新加坡的人的工資也較外勞高許多（當地最窮的人就是外勞），有助於解決貧困問題。新加坡處理老齡化的問題

起步早，50多年前已開始推行中央公積金制度，即香港的強積金制度，而且勞資雙方所供的比率是香港的數倍之高，香港勞資雙方各供5%，加起來僅10%的強制儲蓄，當然不足以養老。新加坡勞方供20%，資方供16%，加起來36%的強制儲蓄，而且中央公積金可以自由的投資、買樓、買金、買股票……悉隨尊便，政府當信託人，不收分文的管理費，每一名退休的人都儲蓄了一大筆公積金。

另外，新加坡有一個非常強勢的政府，過去30年，新加坡幾乎沒有遊行示威也沒人罷工。不久前，一群中國籍的巴士司機在新加坡罷工一天，結果有人被遣送回中國，有人入獄，這是新加坡強勢政府的表現，這在香港是不可思議的，香港早已被稱為遊行之都，天天有人遊行示威。

強勢政府需民意支持

我們要面對事實，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中國的崛起令西方國家不安，西方國家會努力地利用香港來反中國，拖中國後腿。香港本身也有一群反中共的力量，而且這股力量非常強大，立法會選舉分區直選的成績是最佳的參考數據，當然中國的進步會逐漸改變部分香港人的觀點，今年立法會選舉，反對派的總得票率已大幅下降，比較大的問題是不少人高不成低不就，特別是年輕人。今日的香港家庭子女少，因此年輕人沒有找工作養家的壓力，往往因高不成低不就而失業，加上學歷膨脹，大學畢業生滿街走，藍領工作無人願意做，變成工作找人，人找工作。

物價問題比較難處理，許多人說港元與美

元掛鉤是通脹的主因，實際上這是不正確的，人民幣沒與美元掛鉤，中國內地一樣有通脹，新加坡元也沒與美元掛鉤，新加坡的通脹比香港嚴重。

住房問題也是不容易處理的事，香港面對最嚴重的住房問題是土地供應、土地規劃的問題，任何改變目前土地規劃用途的建議都遭到強烈的反對聲音，如果特區政府一聽到反對聲音就收回建議，不敢推行，所以香港住房問題是永遠不能解決，或者只好等經濟不景氣，人們自己放棄買房子的需求。

解決老齡化迫在眉睫

貧困問題要解決不難，香港特區政府手上海多的是錢。但是，胡亂派錢的結果是坐吃山空，儲備遲早花光，今日西方國家的困境是最好的反面教材，人的願望是無窮無盡的，社會上永遠有一批相對貧窮的人，因此，處理貧困問題一定得懂得平衡。

環境問題是全世界的人都在關心，但是，環保不是免費的，環保的成本高昂，誰該付這筆錢？用者自付？為環保而年年加電費則人人反對，收垃圾袋費也一樣會有很多人反對，垃圾袋收費一事談了許多年，總是議而不決，為什麼？因為不知道反對的聲音會有多強？

老齡化的問題最嚴重，已迫在眉睫，但是，這也是香港民間爭議得最劇烈的問題，全民退休保障計劃在西方國家推行多年，現在已全證明是無底洞，負擔越來越重，全民退休保障計劃也帶着很強的社會主義思想，與香港的資本主義思想格格不入，全民退休保障計劃基本上是另一種稅制，是收入再分配的稅制。

我感覺到溫總理口中的六大民生問題，不但針對香港，今日內地也同樣面對一模一樣的問題，或者說，全世界的政府也同樣的面對這些問題，這是所有從政者都得處理、面對的。

作者為香港城市大學副教授，博士

維護中央權力 保障高度自治

□謝緯武



維護中央權力是指維護中央對香港行使主權的權力，是指已體現於憲法和《基本法》中的中央法定權力必須堅定地維護，而這是香港實現高度自治的根本保障。

張曉明來港履新前發表的《豐富「一國兩制」實踐》一文，指出中共十八大報告總結了香港回歸十五年來的新經驗，深入闡述了「一國兩制」方針的科學內涵。他在闡明和演繹中共十八大報告中關於「必須把堅持一國原則和尊重兩制差異，維護中央權力和保障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權、發揮祖國內地堅強後盾作用和提高港澳自身競爭力有機結合起來」的重大論題時，準確地論證了「一國」與「兩制」的關係，指出中共在國家中的領導地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確立，是歷史和人民的選擇；指出中央的權力並不限於通常所強調的外交權、防務權；指出落實十八大報告關於「嚴格依照基本法辦事」的總要求，完善與基本法實施相關的制度和機制，是「一國兩制」社會實踐的客觀要求，反映了香港社會的主流民意。文章令社會各階層更全面、更深刻地領會中共十八大報告對香港問題的新思想、新論述的精神，引起本港政界、法律界、學術界和所有香港傳媒的普遍重視，但反對派亦有人著文另唱反調，這是港人見慣的社會現象，不足為怪。

中央對港擁十項權力

郝鐵川教授在中央任命張曉明擔任中聯辦主任的當天，在《明報》發表了《〈基本法〉規定了中央政府對港有十項權力》一文，以主要篇幅引用了

香港大學法學院陳弘毅、陳文敏、李雪青、陸文慧等學者合編的新版《香港法概論》關於法定的中央十項權力闡述的原文。概言之，郝鐵川、陳弘毅等諸位學者都一致認定：按基本法規定，中央對香港擁有修改《基本法》、國防和外交事務、任命行政長官和主要官員、解釋《基本法》、違憲審查權、全國性法律適用於香港、緊急狀態、審查原有法律、國家行為與司法管轄、禁止叛國等行為的立法等十個方面的權力。郝鐵川作為中聯辦宣傳文體部部長以學者身份，大篇幅引用香港學者著原文來論述和肯定中央在香港行使的權力，與張曉明主任所發表的文章一樣，是希望香港社會各界充分認識中央對香港行使法定權力，全面體現中國對香港行使主權，是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所必須的，是香港實現高度自治、提高自身競爭力生存發展力的根本保障。「文章合為時而著」，張、郝兩位從政的法律學者所寫的這兩篇文章或是直抒胸臆的嚴謹論述，或是委婉陳理的好言指引，是情深義重地希望香港社會充分理解維護中央權力對香港以至整個國家的發展至關重要。

筆者認為，要全面及深刻認識中央對香港所行使的權力，最重要的就是香港社會各界、香港各種政治勢力都必須承認及尊重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一個國家，一部憲法，不承認及尊重憲法，就無香港特別行政區可言，就一切都談不上。

筆者還認為，除了全國人大通過的《基本法》及其三個附件是香港特區的憲制性法律外，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關於設立香港特區、關於香港政制發展、關於《基本法》有關條文解釋等各項決定都屬於香港特區憲制性法律，與《基本法》具有同等法律地位。其他根據憲法、《基本法》和人大及其常委會通過的其它憲制性法律文件，中央對香港的權

力還有設置香港特區區、香港特區政制發展決定權、香港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產生辦法決定權以及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產生辦法決定權，等等，而不只教授們所述的「十大權力」。

須承認尊重國家憲法

筆者還須強調的是：中國中央政府對香港行使的是國家主權。這種權力在國際上是獨立權力，在國內是最高權力。所以包括在居港權在內的人大釋法等香港問題上，不要動不動就跑到聯合國、跑到外國議會政要那裡去搬弄，不要動不動就炮轟中央、侮辱國家領導人。《基本法》是授權法，是中央授權香港特區高度自治而不是完全自治之法。《基本法》第二十條：「香港特別行政區享有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及中央人民政府授予的其他權力。」在一國之內，國家主權是不受限制的（回歸前李柱銘曾提出過「國家主權有限論」，筆者曾著文批判過），所以中央對香港特區的其他授權的權力也會因應形勢及香港特區的需要而行使，不受限制。反對派及其學者至今強調中央除國防、外交外，對香港再無其他權力，並企圖集非為是，為全社會接受，從而限制中央對香港依法行使主權，是「港獨」的危險傾向，極為有害。

維護中央對香港行使法定權力，堅持「一國」原則，關係香港的切身利益、長遠利益、根本利益。香港市民從外僑居港權，「雙非」居港權，以及人大釋法止爭難穩，香港人在國外旅遊營商權益受到中央保護等等系列事實，是看得到，感受得到的。

作者為資深評論員

克里拜卿 對華有益

□陶文釗



國際連線

12月21日，奧巴馬總統正式提名民主黨籍參議員、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主席約翰·克里為新國務卿人選，接替即將卸任的希拉里。這一提名並非出乎意料，實際上，奧巴馬最初提名美國現任駐聯合國大使蘇珊·賴斯為國務卿，在遭到國會共和黨人堅決反對後，一種廣泛的猜測就是提名克里，克里在參議院的個人朋友共和黨人麥凱恩甚至已經戲稱他為「國務卿先生」，所以奧巴馬的提名可以說既在意料之中，也沒有出乎情理之外。

任卿夠格 手腕嫻熟

就克里的資歷來說，當國務卿是完全合適的。他現年69歲，曾是耶魯大學的優秀學生，畢業後於1968年、1969年兩度赴越南參戰，成為一名快艇軍官。他曾不顧生命危險解救戰友，多次被授予勳章。2004年他作為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參加競選時，當時他的戰友（其中有的就是曾經得到過他救助的人）選給他站台，講述他的英雄事跡。但其實，就他本人的政治態度來說，他是反戰的。但克里表示，立場歸立場，服兵役是公民對國家應盡的義務。他1984年進入政壇，當選為麻薩諸塞州聯邦參議員，已經是第五次連任參議員了。他在民主黨內聲望甚高，2004年曾作為民主黨總統候選人與小布什角逐。

就克里的經驗來說，當國務卿也是完全夠格的。他出生於外交世家，從小耳濡目染，受到影響。他長期供職於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最近四年任主席，經常出訪世界各國，與各國領導人有廣泛的交往。奧巴馬提名他時說，很少有人像克里那樣認識這麼多的總統和總理，對我們的外交政策掌握得如此之好。連共和黨參議員格拉厄姆也說，他認識世界上多數領導人，所以當他去訪問一個外國時，他是人們熱識的人。這些話也不是虛誇之詞。奧巴馬當政以來，克里就一再出訪去解決棘手的外交難題。他多次出訪阿富汗和巴基斯坦。2009年，他訪問阿富汗，鼓勵卡爾扎伊進行選舉。2011年，他訪問巴基斯坦，勸說巴釋放被懷疑犯下殺人罪的一名CIA情報人員，並獲得成功，緩解了兩國關係。2010年，他在參議院努力推動批准美俄削減戰略核武器條約。在穆爾西擔任埃及新總統前，他是會晤穆爾西的第一位美國高官。

克里與奧巴馬關係良好。歷史跟他們兩人開了一個小小的玩笑。2004年，當克里競選總統時，在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上一位年輕的非裔參議員的發言引起了人們注意，此人就是奧巴馬。奧巴馬以他的精彩演講登上了民主黨的全國舞台。四年後，奧巴馬自己贏得了大選。克里在參議院供職多年，他與共和黨同事同樣有良好的關係。他們說起他來都是交口稱讚，認為在國會聽證會上不會有任何障礙。

對華政策 難寄厚望

克里對中美關係和美國對華政策也是了解的。他多次訪問中國，與中國幾位領導人都有過接觸。他在參議院的投票記錄表明，對於促進兩國關係的方案他基本贊成。比如，2000年他投票贊成對華永久性正常貿易關係（PNTR）立法。2001年4月小布什總統在上任百日接見記者時曾說了大陸如果進攻台灣他將「盡其所能協防台灣」的話，克里批評這種說法，認為它放棄了長期以來美國在這一問題上的戰略模糊，可能產生嚴重的後果。

當然，美國外交政策的主要制訂者是總統，總統是老闆，內閣成員都是為總統服務的。如果總統與內閣成員意見分歧，這位閣員只好走人，以前有這樣的例子，如黑格國務卿與里根總統的關係就是如此。所以克里當了國務卿，他還是會執行總統的外交政策，包括戰略重心東移。我們不能對他過分期待，認為美國外交政策包括對華政策會有多大的變化。但克里性格比較溫和，做事更加務實，更注意與對方的溝通。他的這種風格還是會對美國的外交政策包括對華政策產生一定影響的，總體上說，他會給奧巴馬的外交加分。

作者為中國社科院榮譽學部委員